

《八十憶雙親·師友雜憶合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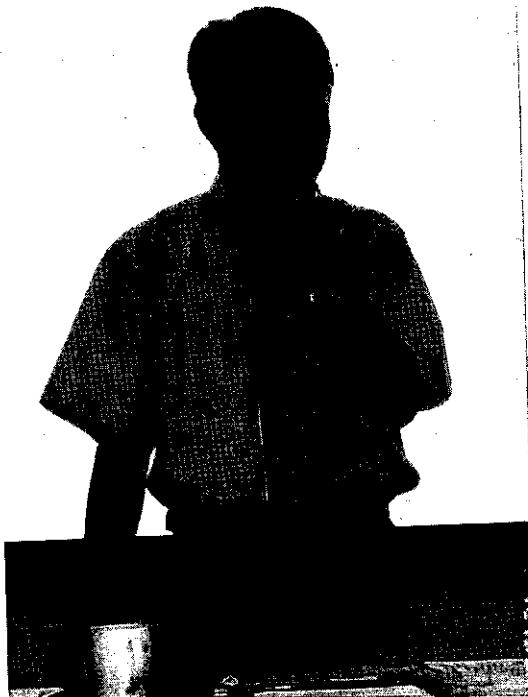
導 讀

書目簡介

《八十憶雙親·師友雜憶》是錢穆先生在晚年所完成的個人回憶錄。此書內容不但說明錢先生一生學問淵源所在和思想的歷程，也描述了從清季民初以來社會的變動與文史哲學界學人的往來情況。與胡適《四十自述》、顧頡剛《古史辨·自序》乃至馮友蘭《三松堂自序》等著作不同的是，《八十憶雙親·師友雜憶》撰寫完成的時間較晚，而且觸及的人物很多。作為二十世紀最重要的學人之一，錢先生在這本回顧自己生命經驗的作品裡也透露了許多豐富且精彩的學界軼事，還有近代中國知識分子在政治動盪及社會變遷下的困境。

錢穆先生著作導讀

中國思想史系列



演講時間：2003年6月14日（六）14:00~16:00

主講人：林志宏（東吳大學歷史學系兼任講師）

講者簡介

林志宏，輔仁大學歷史系學士，中央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現為臺灣大學歷史學研究所博士班候選人，並任東吳大學歷史學系兼任講師。研究專長為近現代中國思想文化史。

《八十憶雙親·師友雜憶合刊》

導 讀

林志宏

前 言

謝謝各位利用週末下午，到錢穆故居來聽講《八十憶雙親·師友雜憶合刊》。介紹這本書的特色之前，也想藉此機會說明，何以有這樣的機會，來為各位導讀，其實有幾重因緣。第一個因緣是，我過去碩士論文處理的是錢先生跟他一群好友，在 1940 年代辦了一份刊物：《思想與時代》。我將它歸類為 1940 年代文化保守主義重要的一支。這批人有一特色，跟 1920 年代堅持傳統面向的人，至少性質上不太一樣的。簡言之，該刊超越我們過去所瞭解的作者群，比如吳宓、湯用彤等；到了 1940 年代，吳、湯反而在某種程度上，或者在《思想與時代》這份刊物上，就沒有顯著的特色。取而代之是另外一批人，開啟了後來 1950 年代「新儒家」的先聲。這些所謂的文化保守主義者有哪些人呢？如文化大學創辦人張其昀先生，還有各位熟知、曾經到新加坡辦學的哲學教授謝幼偉，以及另外一位也是研究哲學的賀麟。當然還有一位青年才俊，後來 1940 年代中

錢穆先生著作導讀

中國思想史系列

期辭世的張蔭麟。

我之所以會研究《思想與時代》，即從《八十憶雙親·師友雜憶合刊》得到靈感。因為在書中，錢先生曾經自我剖析和描述過，他的治學在《國史大綱》完成後有一轉折：《國史大綱》之前他所寫的文章，主要屬於歷史性的論文，此後他所申論的是對一個文化、一個民族所必須扮演的角色，寫的是和現實有關的思考文章。這對一位學者來講，是一種很重要的轉變。事實上我們熟知錢先生幾本重要的著作，其實早自 40 年代就已開始，很多書也是因為《思想與時代》才寫的。譬如各位熟知的像《政學私言》，還有像《文化與教育》，乃至於《中國文化史導論》，這些書有若干篇幅在 1940 年代的時候就已成型。而《八十憶雙親·師友雜憶合刊》裏面，錢先生只把這樣治學心路歷程轉變，說得相當隱晦，後來我獲致另一個佐證，它後來也收在蘭臺出版社新版《八十憶雙親·師友雜憶合刊》（以下簡稱「蘭臺版」，本文即用此版）中。新版有個優點，它和原先東大圖書出版（以下簡稱「東大版」）的有些差別，我也在這邊跟大家說明一下：第一，蘭臺版有經過校對。錢先生開始寫回憶錄時，雙眼已經盲了，很多採取口述的方式。因而東大版有些問題，甚至一些可以說有明顯錯誤的地方，並沒有察覺。

蘭臺版的重出，還將錢先生其他相關回憶的文章收入，包括有關朋友的，或是父母親的部分。我覺得蘭臺版所以有特色，

在於各位如果不僅看了回憶錄，同樣去對照一些錢先生過去回憶別人的文章，其實大可互相發現，這正是新出版本書的優點。譬如，在本書的附錄中，錢先生有篇〈紀念張曉峰吾友〉，就提到自己治學完全的改變，即因為《思想與時代》這份刊物開始，印證了前面我提到的思想轉變。

本書的特色

首先我們談一談此書的特色。為什麼要特別就這方面來談？我個人認為：這對瞭解這本書內容，其實是極為關鍵的部分。《八十憶雙親·師友雜憶合刊》若從成書的特色來講，大致約有三個部分。第一是它涵蓋的時間長。我們都知道，錢先生終身活到 90 來歲，對近、現代學人——即所謂 scholar（學者）的身分來講，其實他晚年寫這樣一本回憶錄，在整個文史學界可說非常重要。至少 20 世紀幾部重要學人的回憶錄中，《八十憶雙親·師友雜憶合刊》涵蓋層面可能最廣。

這裏我想舉些例子，凸顯錢先生的特色，譬如胡適曾寫過《四十自述》。胡先生早年常常勸梁啟超、林長民寫回憶錄、自傳，顯然受到西方傳記文體的影響，可是長期以來一直看到梁、林兩位都沒有寫出來，所以自己先起個風氣，寫了《四十自述》。不過到晚年之後，胡又陸續補充一些類似的回憶紀錄，包括像胡頌平根據胡先生的一些作品、文章所編出來《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篇初稿》，都是 20 世紀學術界的很重要的研究材

錢穆先生著作導讀

中國思想史系列

料。但是如果各位有注意到，胡適先生作品裏幾乎看不到所謂堅持傳統、堅持保守的人；就算偶爾提到也多半是負面的。就這一點而言，我覺得錢先生晚年寫回憶錄的時候，他的立場跟胡先生是不太一樣的。

另外我要講的實例，是胡適的學生顧頡剛先生。顧先生年輕時編有《古史辨》，曾為此寫了〈古史辨自序〉。簡單扼要地說，這篇長序實際上是他學習古史、學習治史道路的總回顧。從當中你可以觀察，胡適和顧頡剛兩位在很年輕的時候，名氣便已相當響亮。他們寫的文字，當然也能引領當時學術界的風騷，並且看出學術界所思考的問題。但很顯然地，胡、顧直到晚年的時候，都還在疾筆直書，編寫相關回憶資料，同時又不斷再修正，或承認過去對與錯的地方。所以，各位如果看他們兩人的憶述，會發現一個很有趣的現象：其中回憶過去的事情，有時候很矛盾，「以今日之我攻昨日之我」。當然，這也是研究他們二位思想的方法上，特別需要加以鑑別的地方。反過來看看錢先生，早年的時候他似乎不會做這樣的資料，我們所能看到是在他中、晚年以後的東西。我們必須注意：這些顯然已經成形的想法，所以他回憶錄中有所謂「是」跟「非」的問題，什麼樣的人是「是」，而什麼樣的人是「非」，可以看出來他的回憶內容非常有系統，幾乎和胡、顧不太一樣。而這正是錢先生本書的特色。

第二個特色就是錢先生書中的人物非常多。這裏我想為各

位舉另一個例子，是馮友蘭晚年寫的《三松堂全集》，其中第一冊的自序也等於是他的回憶錄。雖然錢、馮二位的書均成於1982年，但馮先生的方式跟錢先生又完全不一樣。我們會發現，《三松堂自序》絕大部分的人物行事都被刻意忽略。在這本回憶錄裏面，看到的只是原先一位哲學史家，到後來變成強調馬克思哲學史家的歷程。所以看馮的回憶時，讀者可能體察到他所涉及的地方，就不會像我們想像中的這麼多。反觀在《八十憶雙親·師友雜憶合刊》之中，錢先生描述馮的地方卻是非常多的，但如果你仔細去看，馮的回憶錄對錢幾乎隻字不提。

錢先生回憶錄「人物多」的特色，除了包括像馮友蘭，這些後來變成共產黨的、信仰馬列主義的人外，還有以胡適為首的新派史家；當然，本書最重要的材料，是那群堅持傳統文化的文史哲學界的學人。這裏便可發現書中涉及的人物涵蓋非常廣，甚至還有更多不知名、只在中小學教書教員。這些人可能地位都並非很重要，然而從《八十憶雙親·師友雜憶合刊》大量的敘事，可以看到近代中國的面貌。我覺得以小人物眾多這點來講，恐怕在其他回憶錄上也不見得會看到這麼豐富的材料。

第三項特色是錢先生回憶錄涵蓋地域非常廣。至少本書中，地域空間其實是非常有趣的。各位都知道，錢先生早年曾在江南地區中小學教書，特別像蘇州；後來1930年代後，他應顧頡剛的邀請，到燕京大學教書；之後又轉跳到北大。抗戰

錢穆先生著作導讀

中國思想史系列

軍興，錢先生隨著北京大學輾轉前往西南，成立了所謂「西南聯大」。1940 年代中期，他一度曾經離開了西南聯大，到成都、重慶、武漢各處講學。甚至直到晚年，1949 年在香港創建新亞書院，後來則到台灣。以這樣先後涵蓋的地域面來看，其實非常廣。在某個層面上來講，近代中國人物的傳記和回憶錄裏面，錢先生的內容獨占龍頭，幾乎把整個 20 世紀中國，特別國民政府所到達的地方，乃至未到的地方，有關當時的教育狀況、思想界和社會狀況都完整地描寫進去。各位讀回憶錄會發現，錢先生非常喜歡遊山玩水。對他來說，遊山玩水甚至比自學還重要，更可啟迪知識。錢先生自言有句話讓他一生受用，後來西方學者也曾指出，就是「學而時習之」。這句話對錢先生來講非常重要，等於是他的生平座右銘。因為錢先生認為：做學問不只有關在書房裏面，而是敞開胸懷，隨著遊山玩水時不斷地學習。而且他學問的漸進，如同回憶錄中所見，錢先生學問的增長，伴隨他一步步在各個不同地方，在江南、北京學圈，甚至西南學圈受到不同的影響，慢慢地才奠定後來的基礎。因此，這本回憶錄既可看到近代中國基層社會的情況，還能從各地方不同的層面，看到近代中國不同的演變。不過特別可惜的是，我們在書裏幾乎看不到抗戰末期西北、陝北一帶的狀況，當然這也跟錢先生終生信念有關。然而，至少以成書的特色來講，上述三點是非常重要。

書寫的意涵

其次再說明一下，這本書書寫的意涵。此處為何要談書寫意涵？各位如果熟知近代中國的文言和白話之爭，就能體悟到 1980 年代的時候，錢先生何以還要寫一本以文言文為題材的作品。若是稍微用心閱讀《八十憶雙親·師友雜憶合刊》，會發現錢先生在許多地方，一直不斷留下伏筆，但這些反而需要用文言才能找到個中韻味。我覺得讀本書時，尤其要小心的是文言意涵，它會透露很多不同的訊息，可能一次會讀不出來，需要讀好幾次。這裏舉個例子，我們先從他在《師友雜憶》的自序來看。錢先生提到：

亦有心中極明白極清楚之事，不敢放筆。
若以白話文寫出，則更恐浪費紙張，浪費讀者
之光陰。

於是他就說「知我罪我，是在讀者」（頁 32）。看這樣的序文，讀者可能覺得很正常，並無查悉其間微妙之處。但事實上熟讀本書後即知道，回憶錄可以看到錢先生內心不斷堅持要用文言寫作，相對於白話文寫作，其實非常排斥的。這樣排斥的心態，必須從近代文言和白話之爭，背後傳統文化的背景去看。錢先生說「知我罪我，是在讀者」，讀到這樣一篇自序時，我們好像沒有辦法深刻體會，接下來將以幾個例子讓各位瞭解。

錢穆先生著作導讀

中國思想史系列

首先舉個錢先生書中的例子，這是廈門集美學校期間，他在教書時候的一個經歷。其實錢先生當時會到集美去教書，完全是因為一個偶然的機會。集美位於福建廈門，是處很特殊的地方。這裏從宋代以後就有所謂的朱子學，但以學風來講，至少到近代為止，它一直都不是中國學問最頂尖或最核心的。根據回憶錄，當時錢先生在傳授國文的時候，教了兩個班，後來施之勉偷偷的告訴他，這兩個班之前的兩個老師，所教的課程和方式皆不一樣：一位教白話文，但老師是老博士。所謂的「老博士」，簡單來講，可能是有參加過科舉經驗的人。另一位的年紀約三十左右，但他戴瓜皮帽、穿長袍、教文言文，這真是很奇怪的狀況。由此發現：近代中國所謂的文言和白話，你沒辦法全然去區分，教授文言的是老一輩的人，而教白話就是新一輩的人，至少從錢先生的這一條材料，是看不出來的。至少 1920 年代前，整個中國對文言和白話，乃至背後代表的傳統文化間的觀點，不盡然像我們想像的那麼密切，這是一件有趣的事：年老者趨新，年幼者守舊。

其實，熟讀《八十憶雙親·師友雜憶合刊》會發現，錢先生不斷強調自己對文言的欣賞，不自言明。各位看本書的 110 頁，1930 年代時錢先生人已經在北大，有一位李石岑先生曾問他：你現在還作不作文言文哪？錢先生便回答「然」¹。問這

1 蘭臺版《八十憶雙親·師友雜憶合刊》，頁 110：「君今在北大，尚作文言文否？余答然。」

句話明顯有雙重意思：第一、就是錢先生堅持寫文言。但第二個意思是，在 1930 年代，錢先生已在北大教書，別人還問他這樣一句話，代表就整個北京學術圈裏，文言書寫往往被視為一種守舊的，或是很不好的；反而寫白話文代表一種新潮，只有新的人物才寫白話文。大家都是追求書寫白話文，能夠寫出愈新的白話文，別人看不懂即是最好。錢先生在他的回憶錄中，便以這樣的方式呈現，傳達表達自己對文言的欣賞，而對白話則有排斥。

另一個所舉的例子，是在 1919 年秋季。這時五四運動已發生，錢先生在后宅初級小學教書時的回憶。錢先生說他轉到初級小學有兩個原因，這裏我主要談的是第二個原因。當時大家都提倡白話文書寫，初級小學也陸續改成白話文文體，錢先生自己在 1918 年的時候寫了一本《論語文解》，專在教學生寫作文。他的目的想看看白話文對幼童初學者的利弊得失；也就是說，透過一種方式，知道白話文學習是否造成傳統文字上的斷裂，他顯然非常在意。

我們還可以看到另一個例子，說明錢先生非常欣賞文言。這是在錢先生自己當學生的時代，有一位華倩朔先生，喜歡填詩填詞，錢說「民初以來，爭務為白話新詩，然多乏詩味」，又說「白話必慕效西化，亦非真白話。較之倩朔師推陳出新，自抒機軸，異於當時相傳之舊詩，而純不失其為詩之變。」（頁 35）可以看得出來，無論對詩、或對於文學方面，他希望從傳統出發，若摒棄傳統就沒有辦法革新。而他對當時所謂「直接

錢穆先生著作導讀

中國思想史系列

就是新的」這種看法，是有某種程度上的保留。

直到錢先生至北京大學教書後，也可看出他跟胡適之間的緊張和不同。胡適在 1920 年初期的時候，已是知名學者；當時胡因為提倡白話文，所以希望編一本國文教科書，知道錢先生過去曾經寫過像《論語文解》這樣的書，所以胡適就想找他一起共同寫本教科書。但錢先生的回應是這樣的：

對中國文學上的意見，余兩人大相違異，
倘各編一部中學國文教科書，使國人對比讀
之，庶可有益。（頁 156）

很顯然地，錢先生從各種不同的地方，表達對文言文的堅持。他比較不希望跟提倡新詩、新白話文的人，站在同一個行列裏面。所以各位看回憶錄的時候，會發現其實很多處有特殊的描述，這也正是為何錢先生晚年考慮寫這樣一部書的時候，選擇文言而非白話的方式。在序裏面，他說：「知我罪我，是在讀者」，如果各位單看序言內容的話，可能沒有辦法體察它的涵義；然而你要從回憶錄裏的蛛絲馬跡不斷推敲，才知道原來錢先生是有其基本立場的。所以說，《八十憶雙親·師友雜憶合刊》書寫的意涵，有著特別目的。

對清末民初社會變遷的描述

接下來要跟各位講的，是本書談到有關清末民初社會的部分。過去西方有位學者 Jerry Dennerline，曾在他的書中做過類似討論，書的中文譯名是《錢穆與七房橋世界》(*Qian Mu and the World of Seven Mansions*)。這本書非常有趣的地方，是 Dennerline 先生將《八十憶雙親》翻譯成英文，放在其中的一個章節，非常清楚看到清末的社會狀態。這本英文著作裏面最重要的一個觀點是：錢先生從小生長在七房橋的世界裏面，某個程度上間接地促成了他的人格；書中還說，如果沒有一個這樣的成長環境，就不會有後來素書樓這個地方，也就不會有錢先生之所以一直堅持的文化保守的看法。

我在此將從兩項社會變遷的部分來談：一個是從所謂的士紳社會到現代社會，第二個是教育上的變化。

第一個部分舉的例子，是《八十憶雙親·師友雜憶合刊》的附錄裏面，對於錢先生懷念他父親之處，可跟《八十憶雙親》互相參照。錢講到當時七房橋的社會、宗族裏，他的父親雖然只具有「童生」功名，但卻在宗族中擔任排解宗族糾紛的重要角色。傳統中國社會一旦出現爭訟，不一定非得要直接到官府來打官司，通常先由地方上有功名的鄉紳出面解決事情。不僅如此，有功名的人還能夠引導地方，辦理各項公共事業。對錢先生來講，士紳扮演的地位象徵穩定社會秩序的力量；從小成

錢穆先生著作導讀

中國思想史系列

長的環境對他似乎影響非常深遠，遠勝過後來在北京那樣大都市中接觸到形形色色的人、事、物。我們可以說，幼年成長的環境，是奠定錢先生一生思想的基礎，也是他認為中國的道路應該怎麼走，非常重要的思考。譬如說「喫講茶」這樣的習俗，當地方有糾紛時，大多會循著這種方式在茶館做協調，成為傳統中國鄉紳社會十分重要的現象。所以，錢先生認為知識分子擔負的角色，應該是能培養、參與，或對政治發生影響，即所謂的「學治」。

從整個《八十憶雙親·師友雜憶合刊》裏，可以發現錢先生很多對地方鄉里美俗的詮釋，甚至後來的史學著作，乃至談到他對中國文化的一些想法時，他所強調的是士人如何去領導政治。對錢先生而言，士人可能是中國歷史上，帶領中國繼續往前走的一個重要力量。這些看法與其說是錢先生提出來的重要理論，不如說是他個人的親身體會；而他也認為這樣中國才會有希望。

有關士紳地位的改變，教育是值得觀察的面向。錢先生也提到類似的個案。各位都知道，自從 1905 年科舉制度廢除後，中國的知識階層便面臨仕途和就業無法合一的問題。也就是說，過去的人靠著科舉才能夠使社會地位晉升，可是後來這些原本倚賴考科舉的人，於是斷送了一條路；取代科舉選拔人才改從出國留學、或新式學堂讀書的人中獲得。這樣的情況在當時，就發生若干有趣的現象，錢先生書中常州府中學堂讀書的

時候即有一例。回憶錄說到他哥哥——錢聲一先生師範班裏面情形；當時中學生的年齡，都是二十多歲左右，師範班則為三十至四十歲的中年人。有的人甚至在家裏都已當祖父了，但他的哥哥卻只有 19 歲，甚至還在班上擔任領導班長。從這裏可以看到清末民初新式學堂中有一奇怪的現象：有些人原本可能已在科舉具有功名，可是因為清廷否認此功名的存在，所以迫使那些原來在舊學上有基礎的人，必須重新學習。無論去學英文、理化，還是自然科學，而原先念的四書五經及考試的八股文內容都沒有用。這批人重回新式學堂，他們的年紀都很大，碰到的是另外一批從新式學堂進來讀書的十幾歲小朋友；換句話說，後者可能都算是他們兒子輩的人，所以同一教室裏有著不同年齡層的人。記得包天笑的《釤影樓回憶錄》，也有相同的情形：教書的人大都無功名，或僅是童生，但他要教的人卻都是具有進士資格。這樣奇特的現象，錢先生書中也似乎反映出來。所以，我認為如果研究近代中國教育史的話，本書其實非常值得參考。

接著第二部分，我要談的是教育的變化。各位都知道，錢先生是以教育為終生職志的一位學者。在他的回憶錄裏面，能看到很大量教育發展的歷程，不管是個人從小求學的經歷，乃至於長大成人當老師，之後怎樣去教學。而回憶錄中也一直不斷重覆被提到錢先生對教育的一些看法。另外，《師友雜憶》中也可以看到當時整個教育環節，至少在清末民初期間有很大的變化。我舉幾個例子和大家說明。譬如該書透露出很特殊的

錢穆先生著作導讀

中國思想史系列

訊息。當時錢先生是七歲，書中說「七歲入私塾，十歲進新式小學」，我推測時間應該差不多在 1904 年之前不久。當時中國發生了一項很重要的事情，即維持將近一千多年的科舉考試選拔人才制度，清廷決定為了因應時局情勢，決定將之廢除。我們藉由錢先生的材料可以看到，在廢科舉前，教書的內容由於不同學科，而有各種不同的態度。《師友雜憶》說：「其時諸老師教文史者，初不太受人特別重視。因宿學碩儒，延攬尚易。教理化自然科學者，則不易聘。而體操唱歌先生易甚難得」（頁 33）。他說教文史的人不太受到重視，而教體操唱歌的老師最難聘得，為什麼？因為就在時代風氣之下，新式學堂的課程希望每個人都出外去伸展筋骨，而不是像在傳統私塾裏面，要求每個人靜坐下來讀四書五經。他們唸的是所謂新式的數理科學，學的是新的東西，要求每個人要健身，也就是所謂的「軍國民主主義」。所以各位可以看到在錢先生的回憶裏面，有些地方非常言簡意賅反映時代的景象。

以下例子也非常有趣，是他回憶在果育小學的經過。錢先生說七十年前，這個地方能夠網羅很多對舊學有基礎、對新學能夠融會的良師，可是後來反而覺得不行，為什麼？因為他深覺「禍亂相尋，人才日趨凋零」（頁 41），如果鄉村裏要求一個鄉的學校融合舊學與新學是不可得的，對他來講，特別後來他去教書之後，這是非常令人感慨的。在這本回憶錄中，我們可以不斷地看到錢先生每換一間學校的時候，便對那間學校就有一套整體的看法，特別他一開始的時候是在中小學的學校，

後來有機會能夠到大學執教。他發現傳統的學校裏面，學生跟老師的情感，比較能相互維繫，到大學後反而就沒有了。特別是到燕京大學時，他感覺學生課一上完，各自就走；更重要的是，他到教師休息室後竟是無人理會。那種學習情境之下，錢先生要求的師道不見了，最懷念地反而是以前中小學教書的狀況。儘管他曾說：「舊俗，對私塾老師皆知敬矣，而今謂新小學尤高於舊私塾，故諸師則敬矣特有加。」但事實上，這只是他剛開始的寫法，到後面的時候，覺得這個教育理念，跟理想世界愈來愈遠。

這個部分說明近代中國的教育非但內容產生改變，甚至學生和老師的地位、關係也出現特殊的變化。應該這樣講，「重少」風氣使得學生可能變為學校的中心；錢先生書裏也不斷提到。各位如果看回憶錄將發現，愈來愈多學生的運動風潮產生，其中前後也有不同訴求與演變：從開始到後來的狀況不同。當然我必須強調，錢先生自己年輕時也曾是位學運份子。在常州府中學堂的時候，四年級的錢先生一度集合幾個學生，要求老師減低修身課，擴增希臘文課；但結果是他的要求，轉變成跟五位同學一起被開除。可是錢先生自己在擔任老師的時候，他的看法明顯產生變化，發現學生的角色也愈來愈奇怪。先舉第一個例子，時間是他在集美學校的時候。錢先生首次遭遇學生抗議事件，當時學生召開大會，找來很多老師，並要求老師上台發言。錢先生書說他一時興奮，直言不羈，大談學生反抗學校，如果走向光明，教育是成功的，那就是學校的成功；如果

錢穆先生著作導讀

中國思想史系列

學校教育失敗，今天所有學生抗議學校的事情，「前途恐無光明可及」，學生回去之後，家長還是會叫你們回來，「諸生當憶於此刻所言」。這是最早錢先生剛開始在教書的時候，面臨學潮的情況。

後來在蘇州市立中學的時候，又發生一次學生運動。這次的學運結果決定罷課，因為南京政府拖欠教師薪水，而諸生課業前途有關。所以，當時學生想藉由罷課，派代表到南京去催發薪水，目的不為了學生，是為了老師的薪水。各位可以看到那個時代的氛圍，學運好似變成風氣，風氣一變就會有很多種的變化。比如說，有些老師會支持，有些老師可能會不支持，錢先生很明顯的是後者。因為他認為說學生畢竟重點是在求學，而不是在爭取社會的運動。

我再舉個例子，是抗戰後的一個變化。抗戰之後，學運已完全變成另外一種走向。當時錢先生正處中年，反而對學運事務採用消極的態度，因為涉及的是馬列共產主義的崇拜。錢先生說：抗戰軍興時，他對時局略有熱情，學生也不以事外人士看他，後來抗戰結束本來想回到北平，可是後來還是決定不要。原因是因為學生風潮愈來愈多，幾乎變成是在學生指導老師怎麼去進行學潮。對錢先生而言，這已經是非常嚴重的事情，所以到抗戰之後，他明顯對學潮就不再理會，選擇的是另外一條路。我們可以從這部回憶錄看到，從年輕當學生的時候，學潮剛開始萌芽，他曾是學運的一份子；到後來自己成為教師，知

識份子怎麼來選擇未來中國的道路。

人事的糾葛與學術意見對立

《八十憶雙親·師友雜憶》裏面還有一項表達的重點，就是 1920 至 40 年代，這中間人事、學術間的糾葛和對立。我覺得其實錢先生在此表達地相當隱晦，也是本書饒富趣味的地方。基本上我從兩處談這個問題，第一個是學術風氣的轉換。晚清中國的學術界，至少是文、史學界，曾產生巨大的變化。譬如諸子學興起，即是顯例。當時有很多的人，對此有非常卓越的研究，像孫詒讓研究墨子，梁啟超研究孔子等；可說先秦各家諸子，幾乎每一個都有人在研究，而且研究成果豐碩。錢先生進入學術界後，自然不可避免要碰觸這些研究成績，甚至有所評論，從回憶錄我們可以看到很多。並且，錢先生早年研究的轉折，似乎也可反映整個近代中國文史學界的走向。比如他早年也有意研究諸子，有天忽然發覺《墨子》裏有很多錯誤，後來突發奇想之下，決定將《墨子》進行注釋及考證；但他考證完之後，才發現原來孫詒讓已經寫了一本《墨子閒詁》。

早年錢先生研究方式跟清代的學者是不太一樣。他曾在回憶錄強調，清代學者研究的方式是從經學開始，但自己倒不是；他所以會進入經學領域是從子部開始（頁 83）。經學考證在乾嘉的時候，曾有很長遠的發展；可是錢先生卻恰恰不同，不是先去讀清儒的經學著作，反而先去了解清人文集，知道這些文

錢穆先生著作導讀

中國思想史系列

集裏面所談的內容之後，才進一步去追索經學上的問題。這是他研究學術的一個方式，這個方式受到晚清學術的影響，也就是諸子學的影響，而非以研究經書那種方式去看問題，反而是從別人研究經學的著作裏，去摸索這些東西。我們也可以說，他早年之所以能夠成名，就是因為研究方式不再倚賴清儒研究成果；因為清儒經學研究非常細膩，細膩的程度很可能寫了一本尚書的考證，就花費了大半輩子，但錢先生的方式是去研究清代的學術，從中知曉有哪些重要的人研究，然後去追索他們的問題，最後他才能進一步去發覺其他重要的歷史問題。這是他跟清儒做研究最大的不同處。也因此，錢先生到 1930 年代的時候，寫了一本《近三百年學術史》。該書很可能就是錢先生早年的時候，進入學問最重要的脈絡。

不過當時學術界對先秦諸子的討論，錢先生自己也不能置身事外。說到這不得不談到錢先生跟胡適之間的往來。如果各位細讀本書，會發現一個非常有趣的現象：胡先生似乎始終與他處於對立的立場。我們可以看到很多地方，錢先生因為對傳統文化堅持，也對另外一批反傳統者，有一些想法、批評。

我們舉錢先生在蘇州省立中學教書的經驗為例。那是錢、胡兩位第一次的碰面。胡適那時是鼎鼎大名的學者，據《師友雜憶》記載，蘇州中學校長汪懋祖坐在講台上，特別邀請錢先生坐在旁邊。當時錢先生正研究先秦諸子，發現有幾本書他遍尋不得，於是藉著這個機會向胡適請益；因為胡先生曾寫過一

本《先秦名學史》，是這方面的專家，必然書籍涉略上，掌握已非常清楚。這段回憶文字主要來自錢先生個人的回應，我曾查過胡先生日記，找不到這一段。我個人覺得如果讀錢先生的書時，找不到比對印證的部分必須存疑，而且還能藉此觀察錢先生的意向。以這件事來說，回憶錄說「適之無以對」，演講完畢後，汪懋祖留宴，錢先生也陪席，但是午後胡先生就打算回上海。有人建議胡來去匆匆，何不乾脆留在蘇州玩一玩、住一晚？胡以忘記帶刮鬍刀為由，說「今晨已不可耐，已不能再留。」汪先生就說「刮鬍刀可購可借，區區小事何足為困？」，適之言「積習非此常用刀不可。」意思就是說，如果沒有這把刀的話，我刮不下去。錢先生所描寫的胡適，好像有點小氣或拘謹之類的感覺，跟我們想像的胡完全兩樣。但後來胡也留下一個上海住址給錢先生，說「你到上海的時候可到這邊來找我」。最後這句話我覺得非常重要，可以代表錢先生對胡先生一輩子的烙印——「余意適之既不似中國往古之大師碩望，不是西方近代學者專家。世俗之名既大，世俗之事亦擾困之無窮，不願增其困擾者，則亦惟遠避為是。」（頁136-7）這時候錢先生還未到北大教書，可是我猜這段說法，實際上是後來的總體評價，絕非當時的想法。因為各位如果知道早年錢先生有四封信給胡適先生（收在：耿雲志編的《胡適遺稿與秘藏書信》），曾向胡提出關於上古史，特別是先秦諸子的一些看法，甚至

錢穆先生著作導讀

中國思想史系列

還希望請胡幫他的《先秦諸子繫年》寫序。² 儘管後來《先秦諸子繫年》的序文，胡先生並未參與。但可以得知，一直到30年代到北大的時候，基本上胡先生跟錢先生的關係還算保持一定距離，不能說像我們這邊看到的「遠避為是」，這些想法應是慢慢形成的。

胡先生和錢先生的關係呈現幾次重要變化，各位看《師友雜憶》蘭臺版，它加了很多註腳，有一條在頁151，我覺得非常重要。那條註腳就提到，錢先生之所以能夠到北大去教書，與胡適不無關連。各位都知道，錢先生能夠到燕大教書，主要是由於顧頡剛先生大力推薦。雖然顧是胡適的學生，不過錢先生整個回憶錄裏面對顧頡剛的評價，很顯然和胡先生是不一樣的。可是151頁的註腳告訴我們：顧頡剛先生寫了一封信給胡適，向胡推薦錢先生。所以，北大能找錢先生到教書，我想恐怕胡適先生的功勞居功厥偉；如果沒有胡適先生的話，錢先生的命運大概不至於如此。不過我也猜想：錢先生很可能有生之年都沒看過這封信。總而言之，錢先生能到北大教書，一個最重要的關鍵，恐怕獲得當時北京學界的龍頭之一——胡適的欣賞。而胡適先生欣賞最重要的因素，大概與《先秦諸子繫年》、

2 中國的歷史傳統裏面，寫序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事情。你如果找某人寫序，那就表示這個人，定在這個領域上有著特殊的成就。第二，找某人寫序，總不可能隨便找一位非專家的人，或者是寫一個序不如自己寫的人。所以一般人找某人寫序的時候，可以說寫這個序的人，就是代表這本書的重要性。

《劉向歆父子年譜》脫離不了關係。因為這些著作都是解決近代今古文之爭，或者是諸子問題，都是可能的理由。

儘管如此，錢先生到了北大之後，慢慢才跟胡先生開始有了疏離。像對《老子》的意見殊異，各位看錢先生的回憶錄記載，可以感受到那種針鋒相對的場合。比如說錢先生從來沒有到過胡適家，後來某次經由顧頡剛引領，才有機會前往。《師友雜憶》提到兩人談的情況，話題圍繞在老子出生年代的問題，可是講了沒幾句話就不再說了。在胡適先生的日記裏面，對此也稍微提了一下，感覺上胡好像對這個意見並不贊成，但並無太大負面的東西。但在錢先生的回憶錄裏面，卻很明顯的看出兩人意見殊異。此後，某些對文化傳統的討論上，各位可以看到更多類似語氣。這不能講雙方明爭暗鬥，應該說對傳統的態度和認知不同。導致慢慢地，北京學術圈有群人，總會固定跟某些人在一起，和另外意見不同的某些人隔離。以錢先生為例，記得余英時先生的《猶記風吹水上鱗》也稍稍提過，如熊十力，梁漱溟，這些人對舊學有最基本態度的人，常常聚集在一起。對照他先後只去過胡適家一兩次，甚至不去，相差下頗有天壤之別。

這樣學術見解的對立，同時還反映到課程安排上。《師友雜憶》又提到說，當時北京大學打算開設通史的課，有關課程安排，也是有所扞格的地方。書中言及傅斯年先生，當時創辦歷史研究所，主張鑽研歷史的方式是：每個朝代都要研究清楚，

錢穆先生著作導讀

中國思想史系列

說「孟真不許其上窺元代，下涉清世。」（頁 158）傅先生的態度是以專家之學，透過各種不同的研究工具去討論某個時代。可是在錢先生來講則完全不一樣，認為歷史是一個通史的概念。所以當時北京大學對中國通史課程，曾經引起爭執，最具體的一個例證就是將蒙文通辭掉。蒙文通先生是講中國史，當被北京大學解聘的時候，胡適先生為了這個事情，還特別要去錢先生家，跟錢解釋辭聘理由。對錢先生來講，他跟蒙文通先生私交非常要好；早在到北大之前，就已跟蒙文通很熟了，可是他認為「君乃北大文學院長，此事與歷史系主任商之即得，余絕無權過問。」又說「文通來北大，乃由錫予推薦。若欲轉告文通，宜以告之錫予為是。」（頁 168-9）我們看回憶錄時，隱然深覺明顯有兩股力量在人事上產生爭執。

從《師友雜憶》裏面可以看出，錢先生其實都對所謂「西化派」的人有著明顯的距離，而且說法隱諱。例如，當時的吳宓也在《大公報》辦一份定期刊物，叫〈文學副刊〉。後來該報另外找傅斯年、胡適等辦了〈星期論文〉，然後就把〈文學副刊〉取消。吳宓當時是學衡派的重要人物；《學衡》這份刊物之所以能夠出刊，他是居功厥偉。可以看出：在北京學界中有所謂的新、舊學術意見上的不同，進而產生了一個對文化傳統認知的差別，這是非常有趣的現象。這現象一直延展，直到錢先生到西南聯大執教的時候，都還一直碰到類似的問題。儘管錢先生在西南聯大沒有多久就離開了，離開雲南這個地方，先後跑到重慶、成都，甚至到了我所研究的浙江大學。為何錢

先生選擇離開？恐怕其中的一項理由，是和北京學圈所謂新派人士不太合。我這裏可以舉一段話印證，出自錢先生在一篇文章〈維新與守舊——民國七十年來學術思想之簡述〉。他說：

以余一人所交，在北大如孟心史、湯錫予，
清華如陳寅恪、燕大如、張孟劬，其他南北名
學者，如馬一浮、熊十力、錢子泉、張君勸諸
人，余皆嘗與之一一上下其議論，固同對適之
有反對感。

錢先生會在其他地方不斷透漏這些訊息，可以看出他透過各種方式在為這些人發聲。所以這本回憶錄基本上寫的是一群主張文化保守的人怎麼聚集在一起，這在看胡適或其他人的回憶錄時，難以窺知。

錢先生自己對傳統文化的態度，也在本書中不斷地表達。像他當時在北京教書時，帶著學生曾到山東去玩。有一次還到曲阜看孔府時，注意到墓碑寫了一些碑銘文，內容關於從宋代以後，特別是外族入侵才寫的。錢先生的說法認為就連外族進入中國之際，都還要特別重視孔子；為了要發揚孔道，還要在固定時間來祭祀孔廟，可是到了近代卻被忽略掉，彷彿說現代人比異族更不如。他透過各種方式，透過教育傳達「尊孔」的訊息。

在 30 年代的北京，錢先生個人的學術生涯幾乎到了最頂

錢穆先生著作導讀

中國思想史系列

峰，抗戰時期是他發光發熱的時期。此時錢先生寫了幾本重要的書，當中最重要的一本就是《國史大綱》。各位如果熟讀該書就知道，《國史大綱》的〈引論〉毫無遜色於書中內容，為此還有段學術掌故。根據《師友雜憶》寫到，當〈引論〉開始在報章上刊載時，陳寅恪有次私下告訴張其昀先生，說最近有篇大文章不可不讀。所謂的大文章，並不是要指那篇文章寫出來的文體非常特殊，而是〈引論〉在這個時代、這個環境、這個範圍裏，竟還有人要講所謂的文化跟傳統一類的題材。由於陳寅恪先生留下來的材料極少，所以我們很難另外證實他是否真的講過；不過很顯然的，錢先生之所以把它寫在回憶錄中，說明這段話對是非常重要的。錢先生重視的意涵，反映出這是他想寫〈引論〉的原因。

在〈引論〉裏，錢先生說近代中國歷史分為三派，但他一直關注到焦點是「中國傳統政治到底算不算專制政治」。說穿了，錢先生指涉的對象不是以胡適為首的這一批人，也不是以馬列主義為主義的左派思想這批人，我認為應該是梁啟超。梁啟超形容中國傳統史學都是帝王之家的歷史，因為中國傳統政治就是家天下的專制政治。錢先生的討論提出迥異的說法。他以為士人階層在整個中國的脈動非常清楚，每個時代有不同的脈動。因此，錢先生強調中國政治的實情是士人領導政治，這是整本《國史大綱》中最重要的論點。為了呼應這論點，《師友雜憶》有幾處均談到此一貫主張。首先 1930 年代，錢先生想講授中國傳統政治，可是沒有人聽，歷史系裏面當時系主

任是陳受頤，陳受頤說中國傳統政治就是專制，打算告訴他說不用開了，後來這個課能夠開的成，是因為都是外系的人來聽（頁 159）。第二實例，他在抗戰時期的時候，曾經應馬一浮先生的邀請，到復性書院講演。當錢先生表達有意講中國傳統的政治時，馬一浮覺得非常驚訝，堅持請他一定要講（頁 227-8）。在錢先生回憶錄裏面，一直不斷透過這種隱密的方式，來表達自我對傳統仰慕敬意。

近代中國知識分子的命運

最後要講錢先生《八十憶雙親·師友雜憶》中，透露對近代中國知識分子的命運與想法。很顯然地，錢先生處在一個面對政治發生巨大變化的時代洪流裏。我們從《師友雜憶》第一段看到他有位老師錢伯圭，向他提起以前喜歡讀的《三國演義》，結果發現改朝換代的局勢今後將不存在；然後我們的皇帝是滿人不是漢人；還有他接觸到的中、西文化衝擊，都在腦袋裏盤旋。錢先生一直想要透過各種方式，尤其是歷史的研究，找尋自己安身立命之道。他說：「從此七十四年來，腦中所疑，心中所計，全屬此一問題」，成為畢生從事學問的起點。

青年時期的錢穆先生，和政治並非絕緣體。早在辛亥革命發生前一年，他讀到譚嗣同《仁學》，便把辮子剪掉（頁 58-9），態度算是還蠻激進的。甚至比我們想像的還要早，錢先生就已經接觸了三民主義。有位姓趙的朋友拿《三民主義》送給他看，

錢穆先生著作導讀

中國思想史系列

錢先生說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非常值得探討，而且如果就學術的角度來看，孫所提出來的見解，非常具有獨創性，因為融合中西。但錢先生認為這都是一種學說，不能變成是信條。所以後來有人請錢先生加入國民黨，而錢先生始終保持距離（頁124-5）。可以看出他對政治有不同層面的想法，跟政治保持距離；寧可把三民主義視為一個學說而非黨義。所以，錢先生後來在《國學概論》，將三民主義學說是放在最後面，以最後一章來談這項問題。換言之，錢先生在民國19年的時候寫《國學概論》的時候，是把他當學說看，不是後來我們所了解一個教條式的黨義。

相反的，錢先生內心要求的標準是所謂民族意識，尤其儒家價值，對他而言很重要。我可以舉一個例子，是他《國史大綱》寫完之後，審查意見裏面要求把「洪楊之亂」改成「太平天國」。據《師友雜憶》，錢先生認為這段的歷史，是站在清朝歷史在寫，如曾國藩等人平定太平天國，站的立場是以儒家傳統來看，想要維護官方正統。所以錢的《國史大綱》是用「洪楊之亂」，因為站在清朝的立場。一直到後來，他並沒有刻意要去修改，並不因為審查單位要求，而改變對歷史一些獨特的看法。錢先生雖然同情所謂的民族革命，但立場是站在民族意識背後能否提供傳統精神上去看這個問題。

最後，知識分子對中國未來道路的抉擇，也可以從這本回憶錄中看出，特別當時人內心的掙扎。我舉的第一個例子是張

煊。五四時期北大學生創辦《新潮》，當時有批人堅持要和他們打對台，辦了一份雜誌叫《國故》，張煊就是該刊的編輯。可是張煊也是當年錢先生參加學運，那五人小組裏面其中一個，另一位劉半農也是（頁 63）。錢先生回憶錄裏面先後提到這兩個人，告訴我們什麼呢？我的看法是：這些人早年求學時，都是參加學運的熱血青年，但到後來卻各自選擇另一不同的道路。與張煊的意見不同，劉半農後來曾到法國待過一陣子，後來主張推行白話文，站在胡適先生的同一條路上。從某種意義來說，這些人站在同一立場，都是為了救中國、為了中國的富強，但最終他們選擇的是不同的道路。

還有朱懷天也是不遑多讓的例子。朱氏比較不知名，極少為人注意過，可是卻也同樣反映這個時代問題。朱懷天先生因為老師影響，遵從日本共產主義大師河上肇的學說。受了朱的影響，錢先生與他兩人白天一起教書，下課後對共產主義相互辯論。這段資料說明：錢先生在很年輕的時候，即認為中國不適用共產主張。從《師友雜憶》中也可以看得出來，錢先生形容朱懷天先生是一個外表看起來很冷漠，但內心是很熱情的人。朱儘管信仰共產主義，可是事實上，熱情的原因是為了救中國。他信仰共產主義，甚至因此參加學運；上海發生學生運動時也跑去插一腳，但平時外表卻是一個信仰佛學的人。

由此可知，近代中國知識份子裏，有些人最後走向其實很複雜的：很可能什麼價值都接受，卻只為了一個目的，就是中

錢穆先生著作導讀
中國思想史系列

國的未來；但由於接受不同學說，最後的走向也截然不一。所以，一時人心之分歧，人才之奔驛突出，無共同取向，目的都是為了救中國，可是信仰的東西太多了，每個人都選自己一條路，不像我們所想像那樣。換言之，信仰共產主義也是為了某個憧憬，某個中國未來的憧憬。

類似的例子，我們也可自梁漱溟和馮友蘭得知。各位知道梁漱溟早年寫了幾本重要的書，都是有關哲學，他的立場其實主要站在傳統立場。可是到後來抗戰結束之後，整個國家包括知識份子，對政治非常熱情，甚至於有人信仰共產主義，梁也不可置身於外。當時政治協商會議，梁漱溟自己便積極涉入，組織「民主同盟」，結合許多知識份子，投入戰後中國的建設。書中提到另一實例為馮友蘭。據《師友雜憶》云：

不知語由何起，余言無僭今日當勉做一中國人。芝生正色曰：「今日當做一世界人，何拘拘於中國人為。」

錢先生就說，當個世界人一定要先當個中國人，不然當美國人、日本人都可以。馮友蘭於是無言（頁 245-6）。這段話其實要講：當時的知識分子對戰後新世界到底該怎麼走，到底要站在什麼樣的角度，有很多不同的看法，造成思想上的紛亂。實際上從清末以來一直都是如此，人才很多，但卻沒有一個走向，所有人固然都是為了中國的美好而奮鬥，但怎麼走，大家各自

錢穆先生著作導讀
中國思想史系列

選擇一條、甚至可能是對立的道路，這是很可惜的地方。

可是錢先生認為：不論國民黨還是共產黨，戰後政治紛擾其實沒有站在民主的立場，沒有站在民族大義的立場，所以基本上抱持保留的態度。

這裏我可以舉一個例子。《師友雜憶》提到聞一多先生就是位熱血的人，雖然他們的學問路徑並不一樣，事實上是為了要在亂世裏怎麼走一條路，選擇的這條路因為思想激進，進而去排斥另外一批人。聞一多在清華、北大的時候，是罵錢先生罵得最厲害的，但錢先生最終還是用如此看法來看他。錢先生說，如果在太平盛世的時候，聞一多的命運絕非我們想像的那樣，可能是在學問方面有所精進的人；但是因為受到亂世時局，這個理想竟然是在彼此衝突下，變成了大家各自分裂。在錢先生看來，最後很多人選擇了中共的政權，對共黨政權抱持與人為善的想法。回憶錄頗能解釋二次戰後國共的思想鬥爭，與知識份子到底最後怎麼選擇的課題。包括熊十力、陳寅恪等人，他認為這是近代中國的悲劇。也是因此，才促使錢先生後來決定辦新亞書院，藉著教育培養新一代的人，達成士人領導政治的理念。他一剛開始並沒有到臺灣來，原因覺得香港是學術空氣最自由的地方、最遼闊的地方。只有這地方才有機會培養新一代的士人，然後才能夠挽救中國政治。

這正是錢先生「學治」的看法。他指出中國傳統政治要靠著士人才有辦法維持下去，道統和政統之間經由士人串聯起

錢穆先生著作導讀

中國思想史系列

來，然後中國才有希望。所以錢先生說政治應該以學術來領導，也是他在抗戰時期對國民黨的諍言。

總結本書，我們可以看到錢先生《八十憶雙親·師友雜憶》，內容是非常豐富的。此處限於時間關係，只能跟各位稍微說明幾點，當然還有許多地方是沒有提到的，希望各位將來有機會閱讀本書時，能夠從這些地方出發，重新思考書中豐富的內容和意涵。以上是我在這邊跟各位分享讀書心得，謝謝。